

“城市精神问题”是“城市病”的应有之义

——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述评

郭治谦¹ 康永征² (1.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2. 太原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摘要】“城市病”作为已然的存在,一方面充斥着我们的日常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充溢在社会学者的研究范畴之内。以往的研究较多将“城市病”框定在宏观——社会层面,强调人口、交通、环境、住房、贫困等问题,却较少涉及甚至忽略城市精神问题的考量。齐美尔关于大城市精神生活的诊疗,包括“持续”的精神紧张、理智压倒情感、计算统摄一切的“城市生存原则”和冷漠—反感—矜持(审慎)的人际交往态度以及无意义感的个人存在,这些问题理应囊括在“城市病”的范畴之内,作为“城市病”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结构系统,并尝试通过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城市气质”的建构祛除“城市病”。

【关键词】城市病;城市精神问题;齐美尔;城市气质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和心理的认知领域,“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化(城镇化)的进程和作为客体研究对象的城市发展问题而并行出现的,它不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却离不开城市化的特殊场域。作为英国经济史学家哈孟德夫妇笔下的“迈达斯灾祸”,从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后期伊始,“城市病”已经存在了200多年。可以说,世界城市化进程方兴未艾,“城市病”必然会以相似的特征出现在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之中。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1年的51.27%,首次超过50%……开启了全新的城市发展进程^[1]。然而,这种极具“浓缩发展”特质的快速城市化也使发达国家200年来的“城市病”获得了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样的场景下,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房价等等逐渐进入每个都市人的无意识领域,成为顺手拈来、脱口即出的“口头禅”,也无形中构筑了当下“城市病”的内涵和外延,这种共识在学者们的研究中获得了出奇的“默认一致”。

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病”的研究大都遵循着这样的“默认”,即在认可“城市病”的本质是失调与冲突的前提下,凸显其显性特征的研究与考量。矶村英一认为,城市社会病理指失业、贫困、犯罪、不良行为、卖淫、流浪、自杀和一同自杀、贫民窟、简易旅馆街、江湖卖艺者、交通堵塞和公害等^[2]。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将其定位为: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3]。张经武认为,是指在一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的负面效应。这些负面效应主要涉及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和城乡冲突与社会失衡等问题^[4]。

诸多研究者秉持以上的“默认”,而对于“城市精神问题”则鲜有提及,所涉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赵剑芳认为,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变化的加剧、竞争的日益激烈、心理压力的加大,抑郁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5]。曾长秋等认为,除了社会普遍认同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等典型城市病,在人文社会系统中还存在着抑郁症问题、青少年问题以及乞丐问题等非典型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14年度课题(w20151002)

城市病^[6]。黄翠则提出,城市病包括典型城市病和非典型城市病。……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到处都是形色匆忙的人,没人关心别人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冷漠”、“疏离”逐渐成为城市的代名词^[7]。张鸿雁从“拔根”与“扎根”的城市社会变迁出发,提出“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引发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发生,如自杀率升高、“无因由恐慌”、“群体型社会心理紧张”……^[8]。

实际上,“城市精神问题”是“城市病”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因为城市的主体是人,忽略或者淡写它都不能完整地诠释“城市病”内里,更不用谈规避与治理。好比医生看病诊疗,如果仅仅看到表面病症,不去进行内外联系分析,那么看病的效果显然不会太好,或误诊,或贻误病情。作为一种“现代性病”、“西方病”,齐美尔在19世纪末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撰文《大城市与精神生活》阐释城市社会中的精神问题。解读一方面有助于完整呈现“城市病”的全貌,另一方面对于今天中国城市化以及“城市病”的治理会有一些警示和借鉴意义。

2 城市精神问题:齐美尔《大城市与精神生活》

齐美尔对城市精神生活的敏感和研究基于其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场域。正如日本学者北川东子所言,“哲学家齐美尔立足于大都会来观察20世纪。伴随着产业化而出现的家庭、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和巨大城市的出现等社会现象是当时的时代背景。”^[9]城市生活是齐美尔切身感受体验的生活场域,也是其聚焦透析现代社会危机的重要空间维度。在齐美尔的视野里,“城市不是一种带有社会学后果的空间实体,而是在空间上形成的社会学实体”^[10]。在这样的实体中,齐美尔敏锐地捕捉着柏林市区的每个微观的生活片段、观察着世俗社会中的个体,这些偶然性、碎片性的旁观支持和构筑了其对现代性的解构与反思。

与同时代的滕尼斯和涂尔干相比,他们在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共同体之间有一种认知上的默契,即都认为(或意识层面或潜意识层面),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完全不同于古典时代的乡村生活。现代社会尤其是大城市生活是一种由选择意志决定的社会(滕尼斯)和分工推动下的有机团结社会(涂尔干)。这种社会,失去了乡村的宁静和平和,代之以

城市的喧嚣、烦躁,“在都市生活中没有一种恒定的东西,有的‘只是个体人格的碎片……无穷无尽的印象带来的感官轰击,无名个体的永不休止的并置,产生了加重的神经过敏——它需要各种形式的内向退隐和社会距离来加以缓解——甚至还导致了一种完全正确冷漠的状况’”^[11]。而这正是齐美尔微观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在“货币”这一唯一恒定不变的规制下,齐美尔展开了他关于城市精神问题随笔式的阐述。

2.1 持续的“精神紧张”

齐美尔是一位“心理主义者”,城市生活中的个体是其关注的“主体”。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开篇,他即提出“现代生活最深刻的问题的根源是个人要求保持其存在的独立性和个性,反对社会的、历史习惯的、生活的外部文化和技术的干预,反对完全改变原始人为了自身的生存所必须进行的那种自然斗争。”^[12]因此,“如果要研究典型的现代生活产物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文明的主体的精神,比如我今天所要谈的大城市问题,那么,问题的答案只能从人的适应性上去探究。”^[12]齐美尔潜意识地运用历史演进的方法推进其探究,历史发展与个人适应性成为其研究精神问题的显明路径。

相较于小城市和农村比较缓慢和平淡的感性精神生活节奏,饱受现代性侵扰的大城市的生活节奏要快的多、丰富的多。我们淹没在琳琅满目的城市构件当中,时刻面对着应接不暇的变幻,外在速变的频率超越了个体接受的指数,以至于出现持久的精神紧张。“大城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12]如果说,适当的精神紧张是个体正常适应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须的,那么瞬息万变、纷至沓来的印象则会使正常的防御机制转变为心理疾病、精神问题。现代大城市焦虑症、抑郁症等患者的激增正印证了这个论断。

2.2 理智压倒情感、计算统摄一切的“城市生存原则”

跟小城市建立在情感和直觉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不同,大城市的精神生活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当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使大城市人感到有失去依靠的威胁时,他们——当然是许许多多个性不同的人——就会建立防卫机构来对付这种威胁。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

作出反应,主要的而是理智,意识的加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12]”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理智战胜情感成为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原则。因为,“大城市向来就是货币经济的中心……货币经济与理性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2]”“货币经济与理性操纵一切被内在地联接在一起。在对人对事的态度上,它们都显得务实,而且这种务实态度把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冷酷无情相结合”^[13]。在这种绑定的联姻中,一切特殊的个性和情感都被迫缺席或者无视。因为,现代货币经济和僭越空间距离的市场免除了人与人直接面对面接触的几率,更将理智至上的潜规则奉为“座右铭”。

在理智至上主义和货币经济的支配下,现代人越来越工于计算。“计算的准确性给现实生活带来了货币经济,自然科学则把世界上的事情变成了一道计算机,用数学公式求出它的各部分……货币经济成天在进行平衡、计算,根据数字作出决定,把质的价值换算成量的价值,以此来满足众多人的需要。^[12]”计算统摄了一切,不仅包含物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也难以幸免。城市生活的所有都化约为不同的数字体系,数字的准确性成为规制个体交往的法则。在这个法则之下,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精打细算、锱铢必较、遵求准确,他们用脑行事,心的作用式微,理智主宰心灵,其他任何非理性的、本能的、主观独断的性格特点和冲动都被拒之门外。

2.3 冷漠—反感—矜持(审慎)的人际交往态度

如果说理智至上和计算统摄是外在世界给予主体的规训,那么傲慢、冷漠—反感—矜持则代表了这种规训下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态度。在齐美尔的视域中,傲慢和冷漠一方面是由于过度刺激导致失去对事物差异性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差异的意义和价值变得微不足道。这源于“货币使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得到平衡,通过价格多少的差别来表示事物之间的一切质的区别……货币挖空了事物的核心,挖空了事物的特性、特有的价值和特点,毫无换回的余地。事物都以相同的比重在滚滚向前的货币洪流中漂流,全都处于同一个水平,仅仅是一个个的大小不同。^[12]”

同时,由于大城市人口密集度和流动性,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会像小城市或乡村那样积极热忱。“大都市中的这种交往多是萍水相逢式的交往,彼

此之间是由于一种共同的临时利益而联系在一起。都市人之间的会面既短暂又稀疏,每个人都尽可能地直奔主题。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在相互的交往中就不可能完全付出自己的全部真情,而会对他人有所保留。正因为如此,大都市中的人际交往就洋溢着冷漠无情的色调。^[14]”在冷漠的背后隐藏着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即怀疑一切的人和事。都市人由此而变得矜持起来,而且这种矜持还带有反感、排斥和疏远。个体之间的交往更多是在“角色扮演”的意义上进行的,但即便如此,在舞台的表演中也时常掺杂审慎和回避的因子。

2.4 无意义感的个人存在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现代城市人获得了充分的自由,一方面脱离了宗教、共同体等的管束,另一方面个体获得了彰显其差异性的机会和现实可能。在齐美尔看来,“今天的大城市人是‘自由’的。相互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这种大群体的精神生活条件给人一种个人有独立性的感觉……^[12]”。在这样的场域中,个体似乎可以自由行事,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事实上,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现代货币经济无形中将个体联系在了一起,并成为所有包括个人存在价值考量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所谓差异性的自由便受到限制。于是,为了让社会感知自己,让别人敏感自己,现代都市中出现了一些“与世隔绝的独处、反复无常的怪癖、高贵生活的奢侈^[12]”。现象的意义不在于内容如何,而仅仅在于一种形式,一种藉此自我表现并获得个人存在感的自我制造。制造的结果非但没有达成起初的目的,反倒使个体无意义和矛盾的存在暴露无遗。

总而言之,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现代城市精神生活的图景:一方面是城市对个体性的压抑和湮灭,表现为理性至上、精打细算、冷漠无情、矜持傲慢的风格;另一方面则是个体自主性的争取与宣扬。作为城市生活主体的人,由于货币的主导以及客观精神对主观精神的优势,导致一种矛盾的生存状态。个体的抗争与“城市—货币”的压制共同构筑了现代城市精神生活的病态。

3 “城市病”的再诠释

如果将“城市—社会”类比于临床医学上的病

人,那么对“城市病”的诊疗应该与个体病理学有相似的程序。在个体病理学的实证过程中,医生对疾病的治疗必然是建立在完全的准确的确认病症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对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社会病理学分析也应遵循这样的确认:对“城市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界定。界定不是对其内涵的重新给定,因为内涵已经先在的达成了一致。我们需要再界定、再诠释的是其外延,是内涵所能囊括和辐射在内的部分。

作为一种实在的建构,“城市病”的确以一些显而易见的表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也因此造成了对其认识的遮蔽。现实研究中,典型性问题的不断呈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部分代替整体的误读,并进而引导研究取向的泛宏观维度的考量。齐美尔关于大城市精神生活问题的呈现,从微观视角出发,将问题的中心重新引回到了城市生活的主体——人——身上,并切合实际得出了现代性语境中城市人的诸多精神生活问题。这种揭示恰恰填补了“城市病”认识中的不足,为完整呈现“城市病”全貌提供了历史索引。

实际上,“城市病”是一个“系统病”,既包括典型性城市问题,诸如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问题等;同时也包含城市精神生活问题,如齐美尔谈到的冷漠无情、矜持自傲、距离与排斥、虚无等。不仅如此,还涉及一类问题,如自杀、犯罪、卖淫、吸毒等。“城市病”的外延理应囊括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宏观层面的“城市病”。主要指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显性疾病,是人与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关系的严重失调或冲突现象。失调表现为城市人因过度占用环境资源而导致城市系统的超负荷运行。一方面,人口大量涌入势必造成现有城市资源的紧张或匮乏;另一方面,城市向外在环境扩张必然会造成对环境的大量破坏。同时,相较于城市扩张的速度(算数级数),快速城市化带动的人口流动则以几何级数的速度上升,二者的反差加大了“城市病”的发生。通常主要包括人口膨胀、交通堵塞、生态破坏、能源危机、高房价、城市贫困、公共危机等。

二是中观层面的“城市病”。主要指个体价值行为方面的疾病,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或失衡现象。冲突表现为城市主体人因不适应城市生活或

被城市生活过度压抑而引发的对法律或道德的触犯与僭越,其典型特征是涂尔干语系中的失范和越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或大城市,造成了迁入人口和常住人口双向的不适。一方面,迁入居民原有的认知价值难以实现与城市生活规范和节奏的对接;另一方面,原住居民对急剧的人口膨胀所带来的新城市问题难以应对。“堕距”横亘在变迁的城市场域中,导致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价值和规范经受不断的洗礼和冲击,以致于各种失范现象大量爆发。通常表现为犯罪、街头暴力、自杀、赌博、卖淫嫖娼、吸毒等。

三是微观层面的“城市病”。主要指个体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现象。作为主体的人,兼具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本能属性,偏颇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个体性的不完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由于货币经济与理性的内在契合,非理性或情感往往被驱逐出意识层面,甚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也经常处于缺席状态。城市中的一切都化约为货币以及由此衍生的计算,再加之城市化带来的速变,导致人际互动的不信任、孤独冷漠、矜持审慎以及个体无意义的矛盾存在。齐美尔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谈的就是这层面的“城市病”。

综上所述,“城市病”理应包含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内容,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层面都不能穷尽其本质属性(图1)。由于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所有问题的根源和落脚点都要最终回归到人性的焦点当中。因此,在“城市病”系统的三个层面中,关乎个体性的微观层面的问题理应是“城市病”的核心要义之所在。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关键点,即:城市精神问题是“城市病”的应有之义。我们不能忽略或者淡化它来对“城市病”进行诊断和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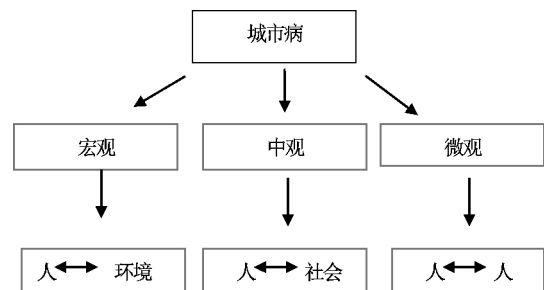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病”系统结构图

4 一种建构：作为祛除“城市病”的城市气质

解构的目的在于建构，对“城市病”系统的全面诊断，目的是为了“对症下药”、更好地推进城市的良性发展。齐美尔关于城市精神生活的阐释，一方面完善了“城市病”的内容，另一方面将关注的焦点和视线重新拉回到人类身上。而正是这种“拉回”使得其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和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当代主义的实证情怀，即，他无意识地祛除“城市病”提供了一个突破口或一种可能：回归和满足主体人的诉求。

问题的焦点再度聚焦于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人身上。对于人的考量，目前存在很多关于人性的假设和研究，这里不做断然的给定，仅仅从属性这一“社会事实”来进行分析。人有两个属性：理性和非理性。理性具有权衡利弊、趋利避害的功能；非理性则更多是情感、自由等感性因子的表达与释放。二者共同维系着个体人的现实存在。在共同体时代，非理性能够得到较好的表达，理性对于非理性的压制被无意识的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而在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理性被运用到了极致，特别是在与自然科学捆绑之后，非理性的空间愈发被挤压和压缩。这是导致“城市病”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解决的关键在于平衡人类属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意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将人类非理性的因子纳入考虑范畴，使城市文明真正彰显人类的全部属性。

以往关于“城市病”治理的研究，大多从宏观着眼，将城市视为主体，试图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人口布局、劳动力转移等角度为城市问题把脉问诊出方子。尽管其中不乏对人自身的顾及，但多是理性层面的——从科学理性高度对人性进行全景式的规划，这不足以从根上解决病症。基于此，提出通过“城市气质”的挖掘与构建达成人性全面的回归，进而实现“城市病”的规避、祛除。

4.1 作为城市精神文化的城市气质

谈城市气质，首先要对城市做个了解。R. E. 帕克在其《城市：对于开展城市环境人类行为研究的几点建议》中提出，“城市，从本文的观点来看，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

的集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机构人员等的简单聚合；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这里，可以看出，城市是人类主观投射的产物，是物质实体与心理精神于一体的客观建构，因而它有自身的文化。我们将城市的文化称之为“城市气质”，意即，一个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和沉淀的独具自身特色的精神品格、价值理想和文化知觉，是城市共同体的集体性记忆和延续。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历史性与现实性。城市气质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城市发展的历史也是城市气质的演进史。同时，它又是现实的，是历史积淀与现实情境碰撞交叉的产物。

第二，主观性与客观性。城市气质沾染主体人的思维气息，是人建构城市这一客观实体的过程体验和产物。很多时候它表现为隐性的伦理道德和集体潜意识，因而具有“意会”性质。同时也存在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如电子媒介、印刷媒介以及其他有形物质媒介得以记录、表现、保存、传递的文化。无形和有形的存在表明了城市气质的主观与客观性的有机统一。

第三，建构性和反噬性。城市气质是主观性的，因此必然也是建构性的。既是历史性的建构，也是现时代主体的再建构，还预示着未来人的建构。城市气质始终处在不断的流变之中，是主体性与客观性互动的结果。同时，历史性也注定了此在个体必然会“受制于”积淀的城市气质，特别是当现代性将其“绑架”后，其反噬性特性就愈发显著化。

4.2 城市气质与祛“城市病”

城市气质的本质在于其精神文化的内里，一方面，作为传统的存在，由于不同文明对人性的不同彰显，其中必然会有一些文明带有对人性全面的或者非理性因子的表达，而这恰恰有助于今天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病”的主要问题在于客观社会发展优于主观

精神,再加之个体主观性中理性与货币经济的相互裹挟,进一步加剧了个性中精神的匮乏或异化。基于此,城市气质的重构成为了可能。

一是挖掘城市气质的历史因子。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气质,这些气质是在城市文明的演进中逐渐累积形成的。这里,既有用语言难以言说的部分,也有建筑和街道遗迹等特殊文化材料反映的部分。历史不仅留给我们带有印记的建筑,更跨越时空向我们呈现一个城市独有的气质,而这是这个城市存续到如今的根本所在。因此,具有理性特质和掌握科技的现代城市人类,一定要积极挖掘城市气质中的历史因素,特别是人文关怀精神,从中发现应对现代性侵袭的精神食粮,进而达成内心的释然与平静。同时,城市的管理者也要对历史中的城市气质进行挖掘,对历史街区、文物古迹等进行保护和宣传,从实践的角度提升城市精神文化的品质。

二是在城市规划中要充分纳入主体人的诉求。现代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缺乏整体规划,即缺少历史因素、整体布局和未来走向的全盘设计,特别是文化因素的缺失。“千城一面”的城市格局已经使城市原有的气质被单向度的经济发展节奏破坏,甚至在有些城市遗失殆尽。在这样的城市生活,除了“城市病”的井喷,别无他物。根据美国学者克拉克“场景理论”,在城市中,生活文化设施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的场景,场景不仅蕴含基本功能,也传递文化和价值观,并形塑着人们的认知和精神生活秩序。因此,在城市的规划中,一定要合理设计建筑物、生活设施、文化场所的布局,使得各类设施组合形成的城市气质达成主体人的完整诉求。

三是由经济城市向人文城市的转型。城市是一个全面的发展系统,在系统内部,既有经济、社会因素,也有生态、人文因素。“城市病”爆发的很大缘由在于对经济发展的追求优于其他因素的考量。因此,从祛除“城市病”和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必须实现由单纯经济型向人文的转变。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注重“城市气质”的有意识地缔造,将对GDP的盲目追求转变为对绿色GDP的追求。

总而言之,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体现的城市气质,务必是将人类的诉求特别是精神诉求囊括在内

的。通过对其的历史挖掘和现实场景再构,试图实现人文精神在城市中的回归。对“城市病”的重新阐释以及由此引发的祛“城市病”的探究,实际上也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

【参考文献】

- [1] 杨传开,李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市病治理[J].经济体制改革,2014,(03):48.
- [2] 【日】矶村英一.城市问题百科全书[M].王君健等,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1197-1199.
- [3]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网[EB/OL].http://www.term.gov.cn/pages/homepage/result.jsp.
- [4] 张经武.意识、理念与策略:刍议“城市病”及其防治[J].城市,2014,(01):33.
- [5] 赵剑芳.关于城市“抑郁症”的思考[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21(3):108.
- [6] 曾长秋,赵剑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病”及其治理[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28(5):63.
- [7] 黄翠.浅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病——以城市人情冷漠为探索基点[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0(6):48-49.
- [8] 张鸿雁.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J].社会科学,2010(10):50.
- [9] 【日】北川东子.齐美尔:生存形式[M].赵玉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9.
- [10] 张阅.齐美尔城市社会学思想述评及其现代意义[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16.
- [11] 周来顺.文化危机与双重救赎——齐美尔视域中的现代性危机理论研究[J].学海,2013,(2):159.
- [12] 【德】格奥尔格·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258、259、259、260、261、262、265-266、271、275.
- [13] 【德】格奥尔格·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87-188.
- [14] 杨向荣.现代性·货币·都市风格——文化社会学视域下的齐美尔货币哲学思想解读[J].云南社会科学,2008,(5):55.
- [15]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 [16] 【法】爱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

作者简介:郭治谦(1982-),男,山西孝义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太原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

收稿日期:2015-05-12

(下转第100页)

71 - 84.

- [21] 王惠珍, 史蕾, 高任琳. 广州市省级养老院内老年人抑郁情绪及生活满意度调查[J]. 护理学报, 2007, 14(2): 5 - 7.
- [22] 公衍勇. 农村集中自助型养老模式构建研究[D]. 湘潭: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10.
- [23] 陈雪萍. 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构建——基于杭州市的实证分析[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29.

作者简介: 肖金花(1977 -), 女, 江西赣县人, 西北工业大学工业设计博士研究生, 中国计量学院工业设计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工业设计、设计管理。

收稿日期: 2015 - 04 - 15

Research on Design of Megacity Sustainable Pension Model

XIAO Jinhua ,YU Shuwei ,YU Suihuai

【Abstract】Megacity pension models change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S curve from a single form to rich form. The sustainable research of pension models along with the aging society will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of the megac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great denseness i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 of megacity ,residential diversity , difference , selective enhancement , endowment demand diversit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o establish a flexible ,open ,sustainable collective self-help endowment mode. The mode is different from the existing pension model ,i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self-help and self-care ability for the elderly , makes use of high technology ,the advantage of network information society. It has four characteristics , including collective pension ,providing individualized pension service demands ,the elderly acting as " dual role" and retirement pattern sustainability etc. Its core idea is self aid independent ,collectivity mutual aid. Around the elderly health , quality of life ,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nsion service needs , the mode provides different types , ways and methods of self-help , and constructs different collective self-help endowment service system , achieves "self-support" and "mutual support" , provides some useful ideas for the future megacity pension mode innovation.

【Keywords】Sustainable Pension; Collective Self-Help Endowment; Megacity

(上接第 85 页)

Urban Disease Means Its Mental Problem: Comments on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by Simmel

GUO Zhiqian ,KANG Yongzheng

【Abstract】As a realistic existence , "Urban Disease" are spreading all the corners of city life ,also the terminology are penetrating into every dimensions of the studies of sociologist. The previous studies often conducted the studies within the area of the macro-level of society , such as population , transportation , environment , housing , poverty and etc. , while the issue of mental problems of city has not been probed , even neglected. The items of urban diseases narrated by Simmel includes the constant nervous mind , feelings overwhelmed by intelligence , " city-living-standard" by calculation ,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ttitude within the style of difference-antipathy-reserve and personal existence without the sense of necessity , which should be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the urban diseases. Based on the conception , the thesis attempts to conduct city makings from three levels , namely , the micro-level , the mid-level and the macro-level , and to get rid of the disease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Keywords】Urban Diseases; Urban Mental Problems; Simmel; City Makings